撰文　Silvia Bombardini　/　编辑　冯婧怡　/　翻译　丁玲玲

Esprit de Corps

团体精神

在这个认可个人主义和自尊心的年代，团体可以表示一个实体，或用来形容“共同行动的一群个体”，团体具有与生俱来的挑衅性。对于那些希望改变现状的人来说，这个术语有时甚是重要。正如时尚学术年刊《Vestoj》的创始人安雅·科隆贝里（Anja Aronowsky Cronberg）在其评论文章《Vetements Phenomenon》中指出，“无处不在的无名幕后工作人员是每一个时尚屋所不可或缺的。在 Vetements，他们成了‘团体’。由于地下风格的流行，他们由局内人变成了局外人。”虽然有时取的只是该流行词的表面意思，但支持“传播团体主义也是一种创意之举”这种说法的理由数不胜数，而控制它无疑违背其最终目的——包容性。除了决心抵制、削弱权威体系之外（在 Vetements 这个例子里，这种决心却因 Demna Gvasalia 在巴黎世家（Balenciaga）个人的上升而遭到了部分破坏），团体作为一种理想化形式，它很大一部分的浪漫吸引力来自其对资本主义者优先权的抵制，这些资本主义者业已融入包括创意领域的所有生产之中。最纯粹形式的艺术团体实际上是没有固定形式的。“暂时分裂主义者”（The Temporary Separatists）是一个女权主义艺术和研究团体，她们重视团体，轻视商品。“团体主义可以成为重新思考什么是艺术实践的一种方式……让我们可以关注过程而不是产品。”根据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关于劳动与生产的区别——前者转瞬即逝，不可缺少，后者用于生产和营利。而团体成员们以个人或团队形式完成创造潜能的过程，正是阿伦特所述的劳动。阿伦特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著作《人类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是 Bunny 团体近期在林地公园举办的那场公共展览的灵感来源之一。“我们为期一天的短暂展览是对阿伦特定义中劳动的必要性和短暂性致敬，”Bunny 成员伊芙·奥德怀尔（Aoife O'Dwyer）说道，“产品（艺术作品）一生产出来就被消费掉。”同时，“我们也确实想解决女性‘作品’商品化的问题。”

典型的团体确实一般都为女性团体。有些人提出假设，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女性的生理优势。由于女性的养育倾向，她们在团体中能更好地相互照顾和相互支持。但其中大部分团体宁愿在男女平等问题上下功夫，采取了与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理论相近似的态度——性别不在于你是什么，而在于你做什么（gender isn’t something one is, but something one does.）。成立全女性团体与这种说法似乎存在矛盾，因为它主张的性别隔离是大部分女权主义所反对的。但是她们的确发挥了作用。与大部分领域一样，在创意领域，女性也没有被给予与男性同样的机会。正如“暂时分裂主义者”的名称所表达的那样，在平等成为标准之前，要先实现平衡。在要么做隐形人和要么被贴标签之间，主张全女性空间的女性们选择了后者，因为她们试图找回一些业已丧失的机会。正如电子生产商保拉·坦普尔（Paula Temple）在接受 The FADER 采访时所言，“可能只有我们实现没有副业、拒绝、破坏、简化、恶意环境和性骚扰时，我们才不会再有那么多理由去创立全女性的项目。”保拉的唱片公司噪声宣言（Noise Manifesto）承诺特推至少 50% 的跨性别艺术家、女性艺术家、非男性艺术家、非主流艺术家和女同性恋艺术家。但是，平等如何才能最终成为标准？2015 年关于女性艺术团体的座谈会中，作家兼演讲者 Angela Dimitrakaki 认为，只有局外人的网络（女权主义团体）达到能威胁局内人（父权社会）的规模时，分离主义才有效。曾经，这可能听起来不切实际，但是在 21 世纪，第四次女权主义有了一个强大的同盟——网络。

网上已有很多关于女性赋权的文章。团体不再需要现实生活中的活动，它们自然而然聚到了一起，在数字平台上成倍地增加。有创意的年轻女性在 Tumblr、Instagram 或 Twitter 找到了安全的角落和志同道合之人。如果现实的美术馆或舞台没有她们的空间，那么网络给她们免费提供了直接展示和接触世界的仅有助于艺术家个人或所在团体的名誉，更重要的是，让人们认识到第四次女权主义艺术家作品中表现的性别歧视、种族主义或精神健康等问题。她们教育了新一代女性，用创新的方式（理论框架、支持、工具等）批判自己身处的环境。经历得到了分享，思想和价值观得到了传播。正如 Dimitrakaki 所说，分离主义不是为了渗入和扰乱系统，而是作为更为长远计划的一部分，绕过并超过这个系统；不论直接还是间接，分离主义好像也影响了第四次女权主义运动的整体审美。前三次女权主义者为了模糊男女界限和对抗性别刻板印象，希望看起来更具男性力量，而第四次女权主义者反而要去拥抱那些甜腻腻的，但无须为此感到丝毫愧疚的女性气质，接纳那些之前被认为是弱点，现在它们都被认为是女性的强大之处。

虽然看起来逻辑完整，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样信服。例如，为了收回女性身体的自主权，最近的女权主义可以说是穿着过度暴露。主流媒体中超性感的年轻女性形象与在网络上发起 #freethenipple 活动的年轻女性自拍照有着根本的区别。后者想表达的是，她的身体属于自己，只要她愿意，就能享受和分享，但差别常常太过细微，无法一眼识别，而且几乎没有时间在网上逗留。虽然催生第四次女权主义运动的网络经常被描述为表面化、无趣味或无价值，但在此次运动中，网络要率先展现其深度。“以打破这些期待为目的的项目中，（女性）人物是基础，” LIVE WILD 团体的卡蜜尔·莱维柯（Camille Lévêque）解释道，“不要说这些作品没有必要。我们得承认，我们不断见证这些作品被作品所批判的机构看到。”即使消息成功传递了出去，人们还是会不自觉地采用父权社会的价值观，仅仅将女性赋权限制在身体上而不是思想上。洛杉矶 Instagram 艺术家安德鲁·沃伦（Audrey Wollen）的悲伤女孩理论（Sad Girl Theory）体现了第四次女权主义的另一种困境。“我感觉自己被现代女权主义孤立，因为它对我要求太高（自爱、伟大的性爱和经济上的成功），我无法做到。”她告诉《Dazed》杂志，“我感觉，女孩子们正被设计：如果我们不为自己身为女孩而欣喜，那么我们就对不起我们对自己的赋权。……全球性的厌女症并不是女孩子缺乏自顾或自尊而导致的。”安德鲁提出，女孩子们的悲伤、难过和痛苦应视为抗议行为，视为团结全球各个年龄段女性的解放姿态。悲伤女孩理论主张用情绪而不是暴力来表达异议，它显然支持第四次女权主义运动，但它的妥协（用情绪不用暴力）与如今很多线上线下年轻女性付出的努力更直接地产生了共鸣。悲伤女孩成了全球范围内众多新成立的女性团体的必选名字之一，例如美国的亚洲悲伤女孩俱乐部、澳大利亚的悲伤女孩俱乐部和英国的悲伤女孩电影等，仅举几个例子。

事实上，网络既促进又阻碍了各个创意领域涌现的越来越多女性团体，虽然她们的首要任务不可能总是保持不变，但是随着其数量的增长，她们有潜力带来真正的改变。为完成使命，她们必须要实现数量上的增长，但这得付出代价。我们确实生活在资本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女性团体可以成为趋势，但第四次女权主义甜得发腻的审美极易被商品化，而且过度使用团体这词可能其导致丧失部分本意。以 Acne Studios） 2016 初秋系列为例，创意总监约翰尼·乔纳森（Jonny Johansson）向《The Business of Fashion》解释道，“在生命的这个阶段，他希望个人在团体中成就更好的自我。”他品牌线提供了 5 款可能实际选择的产品：粉丝杂志女孩（Fanzine Girls）、乡村酷女孩（the Country Cool group）、新酸性后后摇女孩（Neo Acid Post Post DJs）、杀死比尔格纹女孩（the Kill Bill Plaid gang）和恶少女团体（Evil Teenage Squad）。满足了各种品味，且随时可供消费。如今要做到这点并不容易，因为这要求年轻女性艺术家及其团体不怕挫败，保持心灵的纯真。但请记住，没有什么比有雄心抱负和亲密伙伴的女孩子更加足智多谋，更加不屈不挠。

Samantha Conton 为《Polyester》杂志拍摄的《Girl As Weapon》系列照片

“我们大部分的作品被认为是‘艳尸’（exquisite cadaver）。艳尸是超现实主义者最喜爱的表现方式，是一种拼贴形式。”LIVE WILD 的创始人卡蜜尔·莱维柯（Camille Leveque）解释道，“我们中大部分人都有着各自不同的背景。我们所有人都以我们的家族史为豪。拼贴是能如实展现我们是谁的完美方式。”

她的团队中共有 7 名艺术家，虽然一些人成长在黎巴嫩、乌克兰和俄罗斯，但目前都在加拿大、法国、比利时、亚美尼亚和美国。“拼贴、天真艺术和原生艺术被认为是缺乏文化教养的艺术实践，我认为这种说法很可笑。所有本能的艺术形式一直在被批判，好像严格的艺术教育是创作艺术作品的必须。我们所崇拜达达运动或之后的激浪运动，它们蔑视和质疑艺术院校内的所有事物，挑战艺术家、策展人或馆长的角色。”“我们显然没太把自己当回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缺乏深度。”她补充道。

Live Wild

在卡蜜尔看来，真正缺乏深度的是许多现代的女权主义艺术。LIVE WILD 努力与该标签撇清关系。“当前围绕身体赋权的趋势是一场错用了武器的斗争，”她说道，“认为女性艺术家要创作‘女权主义作品’，这种想法太表面了，而且我认为还非常讨人厌。艺术家应该自由创作一批与其身份和出生地毫无关系的作品，创作出专门自省的作品。”她坚称，她们所有人皆为女性只是巧合，而不是声明。

她们更感兴趣的好像是将艺术世界降一个等级。不仅依靠拼贴，而且充分借力网络：“在网上人们好像很害羞，我想，他们是害怕被污蔑或怀疑。但就陈列媒介而言，网络比任何美术馆都有趣得多。正如达达和激浪的艺术家们弃用美术馆和博物馆而采用其他方式来展现他们的作品，在我们的平台上，我们展现能够通过视觉来定义我们作为个体和团体的身份。”

左上 Lila Khosrovian 拍摄的《自然奇观》系列（The Spectacle of Nature） / 右上 美国拼贴艺术家 Lucie Khahoutian 的作品《石榴》（Pomegranate） / 左下 乌克兰摄影师 Ina Lounguine 的作品 / 右下 俄罗斯摄影师 Anna Hahoutoff 的作品《美洲》（Americana） / 边角 法国视觉艺术家兼摄影师 Camille Lévêque 的作品

“从我们创立 Bunny 以来，女权主义团体已大变样，”2013 年创立 Bunny Collective 的萨曼莎·康伦（Samantha Conlon）承认道，“抓住哪些机会抑或放弃哪些机会，你得非常小心。我现在谨慎多了。”“从这波女权主义兴起开始，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就开始接近艺术家和团体，提出‘合作’，承诺‘出镜’。”Bunny 成员艺术家伊芙·奥德怀尔继续说道，“人们教导我们要对主流给予我们的每一次关注都心怀感激，但审视你所创作的每件事物是否确实提升和展现了你想表达的观点也很重要。虽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在考量每个项目时，我们 Bunny 绝对注重这点。”但并非所有事情都朝最坏的发展，正如山姆（Sam）指出，“媒体利用女权主义的积极作用在于，更多人知道了这个讯息，并愿意参与到我们在展览内开展的对话中。”

只要看 Bunny 的规模，这点就非常明显了。Bunny Collective 创立于英国和爱尔兰，是由女性艺术家参与的地方项目。团体内现在有 18 名年轻女性，并且还将进一步发展。“我希望 Bunny 成为形态自由的团体。我希望在世界各地设立 Bunny，提升其包容性，”她说道，“下一步，我想让 Bunny 从固定成员的团体转变为开放的实体。”“我们所有成员的共同之处为，我们希望创作出真实且多数情况下非常个人化的作品。在团体内部，我们有强大的支持和激励，”伊芙补充道，“我们一直怀揣着共同的团体感。我们都向着同一个目标前进。”

她们近期的展览“期望能重新确定一个在当前艺术市场甚至女权主义艺术中不那么受欢迎的主题。通常情况下，展览都以性别、女性化和身体等概念为中心。虽然我们过去的很多项目也以此为中心，但我们认为，是时候尝试举办一场从不同角度看待女性经验的更抽象些的展览。”这场名为“我们在做什么”（What we are doing）的展览 5 月份已在曼彻斯特亚历山德拉公园的林地举办，为期一天。

Bunny Collective

上 Samantha Conlon 以 15 幅摄影作品揭示母女间的亲密关系 下 TIERNNA 作品
边角 Bunny Collective 近期展览“我们在做什么”展览现场

团体无须再立足实体，虽然有些团体依然如此，并且引以为荣。Balti Gurls 由杰内·阿菲亚（Jenné Afiya）于 2014 年末在马里兰巴尔的摩创立，是一个由当地黑人艺术家和棕种人艺术家组成的女性团体。“我们成员中一半是巴尔的摩本地人，另一半是常住居民。我们的创意团体及整个城市从不曾远离我们的思想，”她说道，“我们居住在一个被不平等折磨的城市和国家，但愿意倾听的人一直在增多，这确实非常鼓舞人心。”

“面谈对我们团体的扩大和发展至关重要。没有什么比大家齐聚一堂、感受彼此活力和提出想法更好了。这需要很多合作、对话和讨论。很多时候我们齐聚一堂是在拷问自己，‘我们想看到什么？’或‘我们感觉缺少什么？’每推出一个项目，我们都要经历这个超级棒的过程。从提出想法到最终成型，其中没有太多的外包。”

她们感觉缺少的是像 BLK LUV 或 EDGE CONTROL 这样的活动。BLK LUV2 月份在巴尔的摩的 Penthouse Gallery 举办。这是场以音乐、表演和情书书写站为特点的有色人种女性艺术作品展。当前 EDGE CONTROL 正在举办第三期，突出的是有才华的女性音乐家和有色人种 DJ。“舞会的形象和视觉元素完全参照黑人和棕种人的审美文化，”杰内补充道，“分享 20 世纪 70 年代至 21 世纪初的音乐视频片段或杂志。女孩子们戴着大号环形耳环，镶着金牙，涂着亚克力指甲。”

Balti Gurls

我们见证了现代女权主义如何被人利用，但黑人文化已被利用了几十年。“作为一名有色人种女性，你已经习惯了‘文化侵占’，”杰内说道，“每次遇到瑞秋·多尔扎尔（Rachel Dolezal）（一名假装成黑人女性的白人女性）这样的人，你要么直接无视，要么感觉沮丧。你无法阻止人们‘利用’，但你可以索回属于自己的东西，可以要求得到尊重。所以，年轻的巴尔的摩有色人种女性出现在 EDGE CONTROL 活动现场，去庆祝一番。”

上 Jenné Afiya 在 BLK LUV 分享自己的收藏
下 Balti Gurls 团体，由 Ceilini Kim 拍摄
边角 由成员 Khadija Nia Adell 创作的《Obinrin（女性）》

Siren

“我们非常清楚，作为团体的 SIREN 比各个成员之和更为强大。这是因为我们相互协作所能达成的远比个人所能达成的要多得多。分享荣誉，抵制打碟（DJ）带来的狂热的个人主义和竞争，这也很酷。”因此，SIREN 也恰当地选择作为团体来发言。SIREN 是由 9 位来自伦敦的女性 DJ 和制作人组成的年轻团体。SIREN 将于 1 月份庆祝她们首个成立纪念日——她们承诺，以“一次大规模的活动”，但过去几个月中她们非常忙碌，并已将她们的声音远传到英国之外。“英国和英国以外的人与我们取得联系，告知我们，他们深受启发，对此我们非常自豪，”她们说，“好像我们所做之事已真真切切地影响了人们，而且我们试图达成之事的势头也在其他地方蔓延。”

SIREN 的创立得益于社交媒体的宣传，但除此之外，同 Balti Gurls 一样，SIREN 也是一个牢牢扎根于线下环境的团体。“绝大多数的团体都来自伦敦，或在这里学习。这给了我们看待伦敦存在问题的地方视角。为了回应这些问题，SIREN 应运而生了，”SIREN 说道，“我们的聚会都是在当地举办，而且规模小，由自己 DIY。一旦某项活动发展得太大，就很容易迷失。然而我们非常感激能够通过网络空间和广播节目与全国各地的女性进行联系。”

近年来，这样的网络平台确实成倍地增长。其中的一个先驱是自 1998 年以来一直非常活跃的，名为“女性：压力（pressure）”的平台，它是由 66 个国家 1700 名电子音乐和艺术领域的女性艺术家组成的一个国际网络。但是要令理想成为实践，现实中的活动非常关键。SIREN 认为，女性团体联合起来同样也很关键：“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女性、男性和非二元性别者比例相同且没有结构性压迫的世界，那么这些团体就无须存在了。然而没有压迫的世界离我们还很远。所以，在那之前，有必要展现那些由于结构性原因被排除在外的艺术家。”

上 SIREN 团体
边角 《There just aren't enough women DJs》海报

“我们希望 OOMK 能为女性特别是穆斯林女性提供一个共享作品的平台。在这个具有培养性环境的平台中，创意能蓬勃发展。”OOMK 是 One Of My Kind（同类人）的缩写，由苏菲亚（Sofia）、海巴（Heiba）和罗斯（Rose）三人组成。她们开始出版同名杂志，至今为止，发行五版。“我们希望我们的朋友们能参与进来，希望 OOMK 能成为关于女性和艺术的杂志。我们想印刷很多份，与人们分享，在杂志展中销售，”苏菲亚回忆道，“我们希望女性能阅读它，并为下一版投稿。”

她们确实做到了。2013 年最初发行，现在 OOMK 已发展成为一个约由 15 位年轻女性组成的综合团体。针对主流媒体中广为传播的对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女性的误解，OOMK 热衷于提供另一种真实解读。“我们确实将 OOMK 视为女权主义出版物，但我们不认为，它仅限于此，”她说道，“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将 OOMK 从女权主义转移到因注重女性外貌而常被忽视的女性的思想、作品和信仰上来。”

自 20 世纪初，博客空间出现，杂志作为一种出版形式，本应处于渐渐消失的境地。然而，它们可能会东山再起。“毫无疑问，过去几年中杂志的受欢迎度在上升。越来越多的作家和艺术家通过杂志来分享他们的作品，而且一般人也在通过杂志表达自己和他们所爱热爱之事，”苏菲亚赞同道，“过去这些年，我们举办了很多场杂志展，也看到越来越多参加者以展商的身份回来。我们有了很多合作。因为这是实际生活中的活动，所以事实上它令人们有了实际的接触。”

她们证明了这点：“经营 OOMK 的过程中，我们学到了很多。学会了如何与众多不同类型的人们建立关系，学会了如何与其他团体合作，学会了围绕项目建立团体意味着什么。”

上 OOMK 最初成员，由 Nasreen Sheikh Jamal 拍摄
下 《OOMK》第 4 期杂志内页
边角 《OOMK》第 5 期杂志封面

“创立 Red Lighter 的灵感来源于我的挫败。作为同性恋女演员，我努力寻找能一展抱负的创意作品，但总是失败。搬去洛杉矶时，我接了厌恶女性的恼人肤浅电影角色。这些电影中的工作人员常常全为白人男性。这次经历之后，我开始不抱幻想。”克洛伊·费勒（Chloe Feller）说道。“为了对抗电影行业中无处不在的压迫”，她与女友霍布斯·金斯堡（Hobbes Ginsberg）一起创立了 Red Lighter Films。“我们想在一个排斥我们的体系内取得成功，但一路走来，我们已有点筋疲力尽，”霍布斯赞同道，“我们想在互帮互助和循序渐进的基础上开创另一条通向成功的道路。我们最终目标是发展得足够强大，能对传统的网络构成威胁。我们想进银幕，想制作大预算电影。我们只是想以自己的方式达成目标。”

对影视圈来说，好莱坞的歧视问题并非什么新鲜事，但只是在最近 Dollhouse Collective、 Pacific Standard 和 A Fine Romance 等制作公司开始以实际方式解决该问题。但庆祝可能还为时太早。“围绕好莱坞歧视问题的言论更加突显，”克洛伊承认道，“我认为，电影行业可能正朝着更具代表性的更先进的方向前进。但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别对迈出的这一小步过于沾沾自喜。”“所有这些新成立的‘女权主义’制作公司全由富裕的白人女性创立和经营。她们通过这些平台来提升其他白人女性的知名度，利用了观众进步媒体的渴望，”霍布斯说道，“随着我们进入这个‘变化’时代，我们得提出更多要求，这点至关重要。”电影行业能做的益事有很多。在困扰女性的很多刻板印象上，相较于其他任何艺术，电影可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负责，但是其广泛的受众面也说明了电影在传播包容性和多样性信息方面的巨大潜力。用霍布斯的话说，Red Lighter 如此行事：“你创立了代表边缘化声音的媒体，那么你必须要让那些被边缘化了的声音参与到电影制作每一步中。我们近期制作的电影《All-Encompassing and Everywhere》是一个关于应对抑郁和创伤后遗症的故事。从编剧到制作人、导演到演员，每一个人都亲身经历过这些。因此，这部电影细腻而人性化，既具陶冶性又具征服力。”

上、边角 《All-Encompassing and Everywhere》剧照
下 Red Lighter Films 团体